

必要的世故

陈世旭

童蒙读物《增广贤文》有两句格言“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”，平时常听长辈念叨。但我从小顽劣，没心没肺，哪里会把这么陈腐的念叨当回事。

1980年春，我在《中国作协》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，恰好跟王安忆同桌。看上去她怯生生的。私下听有人议论她并没有什么作品，因为是大作家茹志娟的女儿，才被照顾进来的。之前我在一个偏远的南方小镇，孤陋寡闻，也确实没有听过“王安忆”这个名字。自己才发了一个短篇就写不下去，很自卑，对她就有点同病相怜。以为她心里一定跟我一样压力山大，为了缓解，上课的时候老跟她闲聊。看她课堂笔记全神贯注，觉得没必要，自作聪明指点说老师的这段话该记，那段话不必记。她并不恼，认真听完，依旧是全神贯注。不久，我因事回了一趟老家，偶然在街边报刊亭看到她刚发表在《北京文学》上的小说《雨，沙沙沙》，脑子轰的一响，登时傻了！——那样棒的小说打死我也写不出来！在写作能力上，我跟她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。一个小学生竟然去“同情”一个大学生，并且指手画脚，不是不自量，根本就是搞笑。

为了记住这个教训，我后来借写王安忆印象的机会特地写了这件事。当时我有过一刹那的犹豫：以王安忆的教养，她并没有在意我的浅薄。这么难堪的事我要不写出来，不会有人知道。但我还是写了，并且发表了。一则是算是对王安忆表示歉意，二则是警告自己不要再犯这一类的低级错误。多年之后，王安忆名满天下，中国作协创研室主任、著名评论家胡平先生在鲁迅文学院（文讲所是其前身）讲课，援引此例告诫学员：认真听课并且认真记笔记能成为王安忆那样的大作家，像我这样不认真听课不认真记笔记所以写作没有进步。

讲稿后来登载在中国作协的《作家通讯》上。胡平先生在一次会上见到我，问我是否介意，我对他表示感谢。尽管我对认真听课并且认真记笔记就能成为王安忆那样的大作家、或王安忆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认真听课并且认真记笔记，多少存着疑虑，但我觉得，胡平先生把我作为一个反面教材，首先是对我的教益，一是可以让我避免再做类似的蠢事，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这种蠢事对别人造成困扰。善莫大焉。

忽然就想起了“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”这句话。当初要是听进去并牢记了这句话，就不至于那么浑浑噩噩了。

这句话，听起来挺世故的。鲁迅曾经感叹：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，说一个人“不通世故”，固然不是好话，但说他“深于世故”也不是好话。缺心眼不好，心眼多也不好，的确难。

但世故真的就一定不好吗？

“世故”有很多种含义，可以是一种城府，一种权术，一种心机，一种自私的掂量和对他人的算计；也可以是一种通达，一种成熟，一种防范，一种自我的约束和对他人尊重。“干敏强力，老练世故，审动而果，虑远而成”（宋·叶适《故大宋丞相公墓志铭》），这其实是人生一个应该努力的方向。

我理解，“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”是提醒人们说话应开有必要的节制，遇到自己并不了解的人，不要信口开河，闹不好，轻则像我这样，见识浅陋而好为人师，成为一种笑料；重则遇到坏人，则会被其利用。后面这一条我倒不担心，因为没有有什么被利用的价值，我担心的是这样盲目的信口开河难免给对方造成困扰。

后来在文学社团做业务工作，就同行、尤其是年轻同行的写作发表意见、尤其是负面意见，我总是一再在心里叮嘱自己把握好分寸，点到即止，万不可想到哪说到哪，尤其不可妄下判断，给自己落下笑话倒在其次，挫伤了别人的信心，那就错莫大焉。

瞻览九华山历代高僧墨宝陈列馆赋此

秦史秩

古贤渍墨心似初，
笔走龙蛇密还疏。
棒喝古今驱执念，
心通黄绿解琼书。
眼前磐石印云鹤，
身后莲花刺燕鱼。
已证千年花是影，
休言一念竹为虚。



对于收藏者而言，买假俗称“打眼”，一个生动而形象的词，自己打自己还是被别人打，另论。但这一个必然和自然的过程，又叫“交学费”。

1995年夏天我开始逛潘家园，首次是陪台湾画家兼诗人楚戈先生，他同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专家，同逛者有北京画家古干，可以说是古干把我领进潘家园的，他喜收木匠用的墨斗，那一天就买了四五把之多。

楚戈喜玉，且出手大方，二百元一块的小玉件，在他眼中便宜无比，一口气买下若干，大多是明

清件，说拿回台北送朋友，是一份厚礼。

楚戈购玉的热情传染了我，开始关注各类玉件，并拣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选购，这一来不打紧，竟有些刹不住手，胡乱买下的玉件，大多是凭一种冲动和直觉，或者随口讨价还价之后的妥协。但没想到买到手的玉件，经一位朋友欣赏过后大加夸奖，便有些飘飘然起来，殊不知这种飘然之感正是买假陷阱。

那一日已近集市的尾声，我骑车去凑热闹，尾集人气渐散，或许能碰到急于离京归乡的货主，

买假记

——潘家园散记

高洪波

音的小伙子怯怯地围过来，极神秘地问我：“要不要高古的玉？”

那几日我每夜攻读各类介绍玉器的书籍，满脑子是商、周和战国玉的造型，对“高古”二字十分敏感，河南又恰巧是殷墟及妇好墓的所在地，河南口音便有一种古文化的内蕴，让你凭空产生一种亲切和信任感。

结果是显而易见的，在几个纯朴亲热的河南小伙子的簇拥

下，我买下了一种商代风格的玉龙佩，臣字眼，双阴线，准确说叫“玦”，更了不起的是这块玉居然像烧过的鸡骨一样洁白光滑，人称“鸡骨白”。

河南小伙子们开价三千元，我还价五百，他们争让一番，以一种大度豪爽的姿态，把这件“商代玉玦”忍痛交给了我，他们的眼中满是诚恳，说以后一定和我交朋友，拿到钱后点都不点，很义气的样子。

这件“鸡骨白”自然是假到家的玩意儿，而且在河南批量生产，我几乎用百倍的价格买假的同时，也买到一种经验：凡热情过度的推销，背后注定了有诈。



春风送爽二十载（设色纸本）沈舜安

诗意的生活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那诗意人生是欢乐？是痛苦？是陈年老酒还是风花雪月？其实人生更像一首歌，歌的长短，歌的音色，歌的共鸣是每个人自身的价值观、性格和兴趣爱好所决定的。

夏洪芬与诗结缘，为自己取了笔名：晶石。闪亮的“晶石”伴随她后，仿佛注定了她将会成为诗人。

我与晶石认识很久了，她的短文语句新颖，观点鲜明，遣词造句都很独特。那时我已经开始写诗了，也曾希望她能一起写诗，共同切磋诗艺。但是，晶石说写诗太难了，怕自己写不好。怕写不好却喜欢诗的晶石，选择了朗诵诗歌，她经常参加大大小小的诗歌朗诵活动。

庚子鼠年，新冠病毒的侵袭让家家户户闭门自守，却触动了晶石写诗神经，全身心地投入了诗歌创作。她从一天写一首，变为一天写几首。每次完稿都让我第一时间过目，帮她指点。我发现晶石写诗悟性很高，人也聪明，只要一点拨她就会找到感觉，同时也学会了推敲与修改。所以，与其说是在辅导晶石写诗，还不如说是在欣赏她对诗歌的感觉，欣赏她的好词好句，还有她的坦诚。

晶石写诗有时到了痴迷的程度，有一次，她应邀参加湖南的一个文学笔会，

在机场候机回沪时，突发灵感写起诗来，等她诗写好了，她坐的那个航班已经飞走了，她只能重新改签，晚了十几个小时才回到了上海。

“冬天的上海/没下雪/冬天的心里/蒙着一片雪……”在那个特殊环境里，晶石写出了多篇抗疫诗，她的《放飞》《静》《等待》诗篇都被各类报刊杂志采用。《坚定的爱》还获得了上海陆家嘴“金融杯”抗疫诗歌优秀奖。

《太阳雨》曾让她自己泪流满面，“是爱的炽烈心才如此的绞痛/太阳也泪流成雨……”《如果你爱上了我》还被谱成曲，成了一首动听之歌。正如一位诗评家所说：“晶石的情感诗，何止像亮晶晶的石，更像货真价实的玉”。

晶石的情感诗，犹如交响曲，管弦齐奏，一首首闪烁真情。她的人生感悟短诗，同样也妙趣横生。比如《渡口》：“路漫漫都是口/你听到的/是欢笑还是哭泣/那一脚踏出/是坎坷还是坦途/渡人人生的口啊/千万不能将我渡错”。比如《星》：“是去高山的城堡/是去……/哦是群星弹唱着永恒的诗句”。在诗人的笔下，星星皆能与之一起挥洒美妙的诗行。

晶石的诗注入了她的努力、她的刻苦、她的丰富感情和她的坚定。因此，晶石的诗歌是熠熠生辉的。

将诗意融进生活

余志成



“有一种胜利叫撤退，有一种失败叫占领”，这是谍战剧《潜伏》里经典台词之一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就像我们棋手要赢下一盘棋，经常要从战略角度进行迂回，先暂时撤退、诱敌深入，待时机成熟再果断出击。反之，即使用对手占据了“要地”，也只是局部得利而持续不了多久。解放前我党地下工作者，经常面临这种状况而不能动声色，就像《潜伏》中的由孙红雷饰演的男主角余则成，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，在险恶斗争环境中表现出的处变不惊、大智大勇，令人难忘。

余则成原是军统谍报人员，有着爱国情怀，在和共产党人吕宗方、左蓝等人的交往中，他的思想、立场逐渐发生了转变，此后走上了革命道路，成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。刺杀汉奸、军统“叛徒”李海丰是他胆胆涉险的杰作，面对李海丰“重庆的，还是延安的”的发问，他凛然答道：“抗日的！”

谍战工作艰巨而危险，为了打开局面搜集各种情报，余则成除了和上级派来协助他的王翠平假扮夫妻，同天津站情报处长陆桥山、两位行动队长马奎、李涯展开“职场上的竞争”，他借抓捕李伟民和处理94军许团

长打人事件，不断地帮着贪婪的站长吴敬中敛财，从而赢得了老谋深算的吴站长的信任与好感，“如愿”当上了副站长。有了这层掩护，工作便容易展开——从军调时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的阴谋，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众，到缜密推断出李涯所言“欠了四十几条人命”的袁佩林藏身之所，让这个沾满革命同志鲜血的叛徒受到应有的惩罚。

邻居谢若林是中统老牌特务，察觉到余则成和翠平的身份，还和李涯搭上了线。为除后患，余则成以“交换情报”之名将他诱至野外伏法。

陆桥山回到天津残酷镇压学生运动，余则成和他喝咖啡“走险棋”，让翠平隔窗用驳壳枪击毙陆，久疏战阵的翠平如果稍有闪失，很可能误打到余，心理素质得何其强大！

曾密派延安的李涯自以为可以抓住余则成，不料廖队长以共产党人的大无畏气概抱

松江区政府派区委宣传部部长张如皋挂帅，区广电局、文化局等各有关局领导无不到场出谋划策。新闻界德高望重的王维老及《上海新闻史》主编马光仁老师也到泗泾察看修缮现场。笔者义不容辞，选出200张史公生平、功绩图片布展。老屋土木大修，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老（已故）为“史量才故居”铭牌题词。

1924年，史量才事业如日中天，被朋友劝说才建造了哈同路9号（今铜仁路257号）“史公馆”。随即，他给兄长2万元，买了200亩地，建造了这栋小巧精致的楼，便是在镇上江达北路85号“史量才故居”。

史量才父亲1921年逝世，唯有兄长史家桢留守继承父业。传说这位兄长非亲生，是父亲在泗泾抱来的，又说是父亲与一寡妇私生子。但，兄弟亲爱如己。据史家桢孙女说：当时，为造这栋楼，阿爹花了不少心血，到处选地址，找人设计，日夜在“工地”察看、监督。史公馆造好后，史量才将家桢儿女都接到上海史公馆，培养侄儿侄女读书，毕业后安排他们在银行工作。这使深爱弟弟的兄长既觉光彩更觉得得意不去。在打地基时，将墙角楼基处嵌了块小花岗岩石，镌刻着原配弟媳鲜明的名字：“庞明德”。

当时，史量才已有一妻二妾，原配庞明德是内外一致公认的善良贤德大度。她把丈夫、独子都让给了沈秋水，自己退居二线。外人、亲戚都为她不平。史家桢经常将她接到泗泾住些时日，与兄嫂一起度过相亲相爱的快乐日子。

1949年以后，空关着的“泗泾史家老屋”，被用作松江县委办公处，之后，造了县（区）办公楼，搬到了松江。这楼，便作为泗泾镇办公地。不久，泗泾镇盖起了宽敞崭新的办公大楼，故居成为镇图书馆。

2000年，史量才诞辰120周年，如何来纪念这位伟大乡彦，了不起的新闻大王？镇政府决定将镇图书馆装修后，改成“史量才故居”。

松江区政府派区委宣传部部长张如皋挂帅，区广电局、文化局等各有关局领导无不到场出谋划策。新闻界

德高望重的王维老及《上海新闻史》主编马光仁老师也到泗泾察看修缮现场。笔者义不容辞，选出200张史公生平、功绩图片布展。老屋土木大修，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老（已故）为“史量才故居”铭牌题词。

2000年11月17日，在“史量才故居”门前场地上，“史量才故居修缮落成典礼”大红横幅下，举行典礼。所有到会成员及记者们都仔细观看了展览。当晚新闻报道播出，影响不小。

十日谈

影视中的共产党员

责编：杨晓晖

革命年代隐晦的爱情，让那时的观众过足了瘾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史量才故居有故事

庞荣棣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